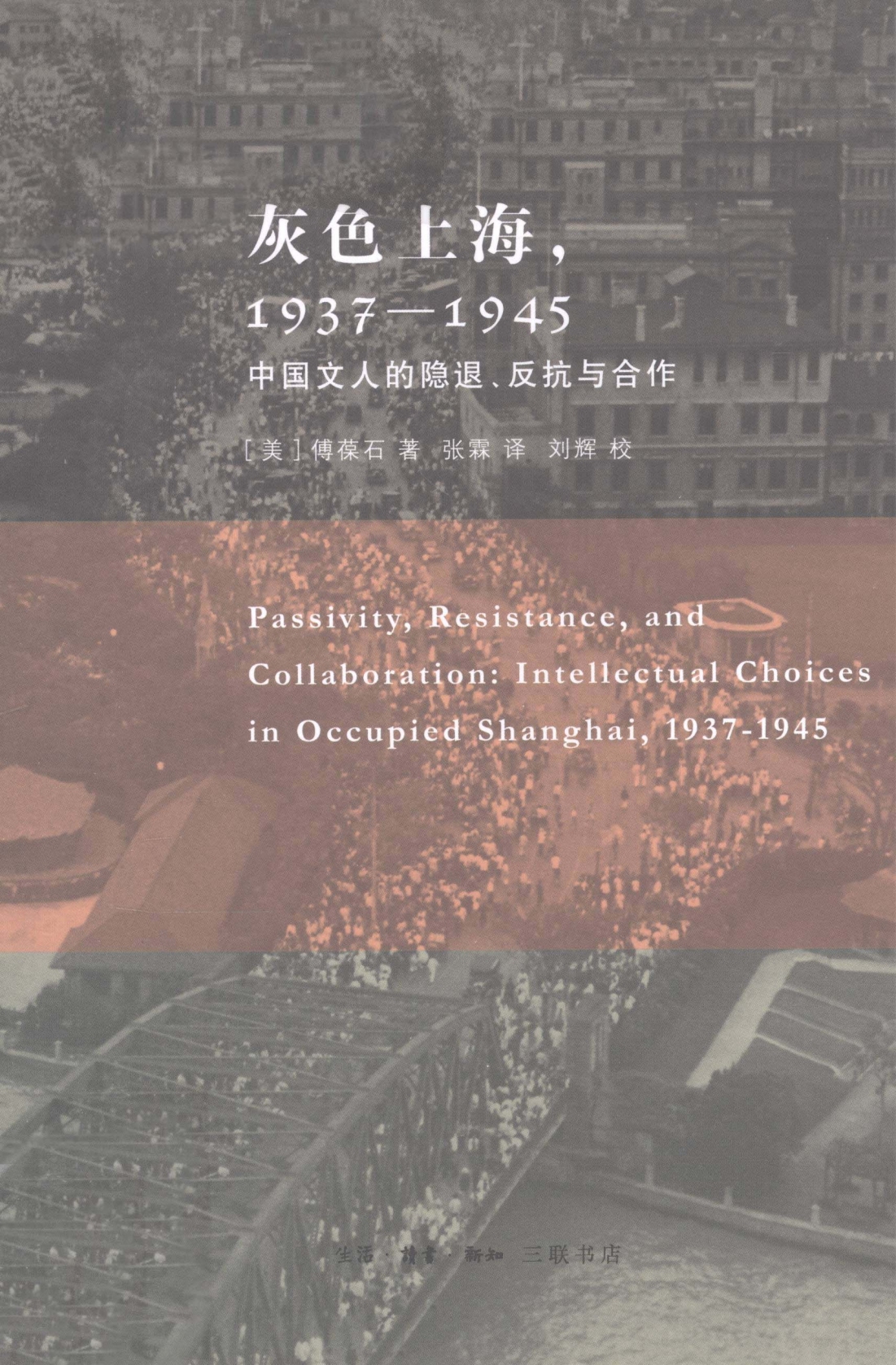


灰色上海，1937—1945

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

[美]傅葆石 著 张霖 译 刘辉 校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灰色上海，
1937—1945
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

[美]傅葆石 著　张霖 译　刘辉 校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 /（美）傅葆石著；张霖译，刘辉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8
ISBN 978-7-108-04082-4

Ⅰ．①灰… Ⅱ．①傅… ②张… ③刘… Ⅲ．①知识分子－社会生活－研究－上海市－1937～1945 Ⅳ．①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5068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扉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6
字　　数　189千字　图15幅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35.00元

中译本序

对我这个平凡不过的人来说，1989 年是极不平凡的。这一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接着便顺利获得了教职以及收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送来的出版合同。这便是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由我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1993 年在美国出版。

我读书时，对身处历史大变动的现代文人的生存状态、文化认同和观念矛盾很感兴趣。80 年代初的美国校园，二次大战欧洲大屠杀研究，正好非常红火。我读了很多像 Primo Levi，Elie Wiesel，Aharon Appelfeld 与 Werner Rings 等幸存者传诵一时的作品，深深觉得其中一些论点和视角，特别是否定传统的二元道德对立观，强调个人在面对危机处处、暴力重重的极端处境下的暧昧多义性，有助于重新检视抗战八年中国文人的困境和抉择。

我便开始认真阅读抗战史。自战后以来，国内外的抗战史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甚少触及战时的人文处境，而且不同程度地都受到了冷战意识的影响。抗战中国的政治空间一分为三，研究焦点却集中在国民政府主政的西南大后方（国统区）和共产党控制的西北边区（解放区）。日军占领的沦陷区成了抗战研究的边缘。

我素来对边缘情有独钟，又刚好有一个机会去上海收集资料，于是决定聚焦研究日占时期（包括孤岛和全面沦陷）上海

的人文处境。80年代中，上海开放不久，百废待兴，档案资料不易看到。幸运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在整理出版“孤岛文学”资料，我得以读到一批当时的文学作品，对这些作家的困境和挣扎有了初步的认识。不过，最大的收获是有缘认识到30年代享誉文坛的作家许杰，以及通过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的介绍，与德高望重的散文家柯灵先生建立了一段长达三年的鸿雁之交（其中部分书信收录在《收获》上）。两位前辈文人在历史面前胸怀坦荡，无畏无惧地向我述说日本统治下上海的复杂情景和他们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言行深深感动了我，也加深了我对日军铁蹄下求生的中国文人的了解。

我也在香港的几所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些资料。1986年我回到了美国，一头便栽进了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我发掘了很多在当时少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包括《上海生活》、《新申报》、《风雨谈》、《古今》和《天亮前的孤岛》等书报杂志。这些资料让我得以重构抗战时期上海复杂多变的历史场景，以及因各种原因未能逃入大后方的中国文人，在日敌高压统治下险狭困顿的生存处境。我运用思想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分析，从历史阅读文本，重塑作者的心灵困境和思想挣扎，把当时文人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的道德夹缝中做出的种种抉择和承担，标出三种主要形态：隐退、抗反与合作，并分别以小说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小品文作者群（包括文载道）作为代表。这些作家不是文化名人或是文学大家。他们没有振臂一呼领袖群伦的才情，他们社会资源有限，却因此多了一份亲和感和平凡气。他们代表了日据上海的大部分文人（以及民众）所身处的“灰色地带”。不管他们是大隐于市以沉默宣示反抗，或是不甘屈服参与深藏抗争意味的剧场演出，又或是有愧于心专写远离现实政治的风花雪月，他们的困境和抉择充满了暧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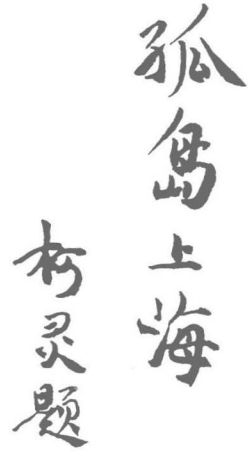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性。究竟沉默代表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究竟有多少话剧观众看懂深藏剧中的反抗意味？究竟谁是汉奸？谁决定谁是汉奸？近百年来中国战乱不断，在沦陷区惨淡求生的中国人负荷了历史的重压，承受了战争的苦难。我们需要以宽容、谦卑的态度重新梳理这段复杂沉重的历史，重新注视他们的挣扎与尊严。

《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是我写的第一本英文书，也是我的第二本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中文书。我非常感谢张霖的坚持不懈，她为了翻译尽心尽力。陈建华多年来对翻译出版这本书非常关心，刘辉了解我的学术思路帮忙修订，他们的友情弥足珍贵。我希望《灰色上海，1937—1945》能为读者带来新知识新视角，答谢大家的美意。

傅葆石

2011 年 1 月



柯灵先生为本书
英文版所题书名

绪　论

本书研究的内容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侵略时期面临的道德和政治抉择。欧美学界已经对纳粹侵略欧洲时（例如法国的傀儡维希政府）人们的生存处境做出了卓著的研究，同样，中国史学界也对同时期沦陷区人们的生存问题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不论在大陆、台湾还是西方，当前关于中国沦陷区的历史研究都不免有偏隘的政治化色彩。要么是傀儡政府问题，要么是个别汉奸的“迷思”：为什么汪精卫或周佛海要为日本人工作？傀儡政府产生的政治/外交背景是什么？蒋介石和汪伪政府的关系怎样？或争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之间，到底谁领导了抗日战争，谁领导了沦陷区的抵抗活动？[1]

---

〔1〕 关于汪精卫政府的最著名英文研究是 John Boyle 的著作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Stanford, 1972），这一研究特别重视汪政府对日本的看法及其与日本的关系。也可见 Gerald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ese War*（Cambridge, Mass., 1972）。在中国大陆，由于汉奸和汪精卫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等问题的政治敏感性，相关问题的认真的历史研究直到 1980 年后才得以进行。在开创“汪伪政府研究”这一新领域方面，上海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直到 1984 年，在主编黄美真教授的大力推动下，计划七卷本的汪精卫政府档案资料《汪伪政权资料》中的三卷出版了，其中两卷是由黄美真和张云合编的。基于这些资料和一些还活着的上海、南京的附逆者的个人采访，很多关于汪政府的重要书籍在 1980 年代出版了。比如，黄美真、石源华、姜义华著，《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然而，在台湾，还远远没有关于“二战”期间投降问题的共同研究成就或书籍出现。至于台湾学者对汪政府研究的成

唯一的例外是耿德华（Edward Gunn）的先驱著作《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 – 1945*），提出北京和上海的沦陷区文学独具“反浪漫”的讽刺品质。他的兴趣点集中于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定位问题（另外，书中有大量两地政治状况的介绍），但有关沦陷区文学作品和历史背景之关系则没有涉及。因此，日据状态下上海文化人的道德立场及不同的个人心路历程至今为止仍不为人所知。[2]

上海是沦陷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汪精卫政府控制的最大城市，本书关注的中心是上海知识分子的生活，通过理解他们面对日本侵略产生的道德和政治心理嬗变，修正历史研究视野的不平衡。这一研究所考察的，不是历史中一群个别的、难以理解的知识分子；相反，他们代表了理性的知识分子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换言之，他们的生活和想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探究沦陷上海的普遍情绪和精神状态。为了突出这一点，我选择了“作家”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能用生动的想象把自己的情感和内在

（接上页）就，可见陆宝千著，《论汪兆铭之叛国事件》，载《抗战救国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5，939—960 页。

〔2〕 在上海，与历史学家对于附逆合作的新兴趣相应，文学批评家业已开始对沦陷文学有所关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已经成为这一研究行列中的主要力量。尽管目前尚未有系统的上海沦陷文学研究出现，但两部非常有用的研究资料集：《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和《上海孤岛文学选编》已经出版，题名为《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的多卷本科研项目的卷 2 和卷 3 也将分别陆续出版。这些资料只涉及那些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同志”（如阿英和于伶）和“朋友”（如郑振铎和柯灵）的反抗者，那些与中共无甚关系的作家则被略去不谈。另一方面，在台湾，研究东北文学的学者刘心皇已经出版了两本关于战时中国的附逆文人和抵抗文人的书籍，尽管这两本书内容非常翔实，但基本上是沿着狭义的“爱国”分界进行分类的资料汇编，而且其道德和意识形态色彩过于强烈。

感受清晰地表达出来，并给人以美的享受。由于深受文以载道传统的影响，危机时代的作家们自视为中国的良心和痛陈民众疾苦的道德精英。因此文学作品成为一种介质，使我们能够探究沦陷上海发生的人情冷暖。[3]

1937 年 8 月 13 日到 11 月 12 日的三个月战争后，上海落入日本手中，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才得以解放。这座城市的沦陷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37 年到 1941 年 12 月，第二阶段从 1941 年 12 月到 1945 年，这一分期取决于上海的空间政治结构的变化。上海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黄浦江向东流入长江口。这是一座华洋杂处的城市，由华界和外国租界两个区域组成，由不同的政府管理，行为依据各自的法律，并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水平。

因为西方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自称中立，所以其管理下的上海外国租界（英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保存完好。而上海的华界（由 320 平方英里组成上海特别市政府，包括江湾、闸北、南市、杨树浦和浦东）及其腹地在 1937 年 11 月被日本占领。这座外国租界组成的小城，北至苏州河（仅距日占区 55 米左右）、向南以南市徐家汇为界、西至无明确分界的越界筑路区，虽不足 10 平方英里，却为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逃往英属香港或无法进入未占领地区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这个由外国提供的避风港通常被称为“孤岛”，即被占领大都市中的

---

〔3〕 关于中国作家的社会角色的讨论，见 Rudolph Wagner，“The Chinese Writer in His Own Mirror: Writer, State, and Society - the Literary Evidence，”收入 Merle Goldman、Timothy Cheek、Carol Harmin 编，*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Cambridge，Mass.，1987），183 —232 页；另见 Ezra Vogel，“The Unlikely Heroes: The Social Role of the May Fourth Writers，”收入 Merle Goldman 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Cambridge，Mass.，1977）145 —160 页。

一个享有特权的地区。与“二战”期间同样经历过沦陷的欧洲和亚洲其他城市相比，“孤岛”上海拥有了特殊的体验。但必须说明的是，尽管“孤岛”摆脱了日本直接（和间接）的控制，自由表达的空间仍旧是有限的。在整个沦陷时期，这座城市卷入日本特务部门和国民党地下机构所操控的黑社会恐怖活动中——暗杀、绑架、敲诈勒索，爱国者与汉奸的生活都很危险。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孤岛”消失，上海的这一局部沦陷的情况很快就被打断了。

偷袭珍珠港之后的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上海外国租界。自1843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来，全城再次被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然而这次却是异族的统治。这次统治带来了沉痛的后果，全面镇压和银行倒闭使上海变成了人们所说的“黑暗世界”。这一情况直到1945年8月14日下午，南京路跑马场广播裕仁天皇投降之后才得以改变。

八年沦陷中，上海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置身于个人生存与公共道德的两难抉择中：一方面是活下来、照顾家庭、追求自我利益；另一方面是爱国责任和尊严。大多数留守上海作家为苟活在敌人统治下而感到羞耻，他们恨自己未能背井离乡，没能到经济落后的自由内陆地区去应对新的不确定的生活，这一道德困境深深地折磨着他们。他们应该继续妥协吗？他们怎样才能在日本的侵略下逆势而动，维护人格和爱国理想？要是妥协不可避免，他们又该做什么？

在战后中国，日据时期的各种道德选择被简化为界限分明的两极，类似摩尼教的世界——英雄对抗恶棍，无私反抗者与无耻汉奸的斗争。然而事实上，沦陷上海种种道德选择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不同于这一简单的模式化观念。在极端的恐怖中，只有模糊暧昧的反应才是自然真实的，这就是普里默·莱维（Primo Levi）所谓“灰色地带”（grey zone）的生存方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软弱、不可避免的行为不一致，甚至某种程度的妥协，还有尊严和道德勇气，这种种状况是任何一个试图面对敌人而幸存下来的人都经历过的。[4]只有少数的上海作家公开反抗，但他们同样经常害怕、犹豫和动摇。相反地，许多附逆文人在战争后期始终生活在良心的责备和悔恨中。故此，本书主张将知识分子在日本占领中的“灰色地带”分成三种模式，以取代战后的二元模式化观念。

仿效传统文人在历史上道德与政治动乱时代的三种行为——“隐”、“忠”、“降”，[5]沦陷上海的作家们做出三种反应：消极抵抗、积极反抗与附逆合作。每种选择都代表了一种哲学理念、一种人物原型、一种历史对比，都源于个人生存和爱国理想的两难抉择。这一历史回响不应该被解读为“历史的倒退”或者“传统的复活”。相反，它是阐释学上的对话——即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交流。换言之，两个时代间的融合意义大于对立的意义：现在被过去的光所照亮，而过去又只能根据人们现在所共有的忧虑和设想去理解。事实上，沦陷上海出现的这三种传统反应模式具备了后“五四”文化语境中独有的意识形态意义。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人为的建构并非历史的真实。这三种模式仅仅是启发性的概念和描述性的分类，它们并不能穷尽沦陷上海知识分子在选择上的模糊性。有益的一面是，三种模式有助于避免战后的僵化道德观念，不至于陷入愚忠和是非

---

〔4〕关于“灰色地带”见 Primo Levi,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Raymond Rosenthal 英译, New York, 1989, 特别是 36 —69 页。

〔5〕这些类型在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关于明清之际的研究《洪业》（*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2 卷本, Berkeley, 1985）中有精彩的论述。

不分的后结构主义式的错乱中。通过一些文学作品的考察，减少刻意的人为区分、填补历史空白——如同萨义德（Edward Said）所形容："仿佛存在于一个抽离历史时空的文本世界里。"[6]要了解人的特定角色，应面对其形成的特殊历史困境，即充满困扰和道德不确定性的情境，我的三分法不仅使价值判断成为可能，而且敏锐地保留了莱维所提到的异族统治下反应的复杂性。

为了能够平衡道德判断和历史相对论两个方面，三分法能够最灵活地分析知识分子，提高我们对于所谓道德模糊"灰色地带"的认识。可以据此推论，许多作家选择隐遁的生活协调个人生存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冲突。消极隐退成为他们一种象征性的抵抗态度，一种不用牺牲太多理想就可以保存性命的"有尊严生存方式"。而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积极反抗者，能在"忠"的英雄传统下不顾个人利害为民族气节而战，进而呼吁大众的觉醒。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虽然这种态度也无法保证言行统一）。而另一方面，许多附逆文人则想办法减轻他们的道德负罪感。他们强调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把自己描绘成遗民，以与现实完全矛盾的生存方式，在怀古中表达他们感情的疏离。这样，在消极抵抗者选择退隐以保全人格

---

〔6〕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1983, 39页。关于后结构主义者对于战时通敌的研究，见 Vicente Rafael, "Anticipating Nationhood: the Philippines Under Japan"（未刊论文，1990），尽管我不同意后结构主义的去政治化倾向，但它那扬弃了理论上的过度一体化（overtotalization）和与之相关联的普世超我观（transcendental ego）的世界性视野（cosmopolitan），肯定各种生存状态的具体多元性，对于学术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见 Mark Poster,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Search of a Context*（Ithaca, N. Y., 1989）的相关主题；也可见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收入 *Social Theory Today*, A. Giddens 和 J. Tuner 编（Stanford, 1987），195—223 页。

的同时，积极抵抗者则以道德的反抗界定人性，而附逆者则辩护他们想要活下去的意愿是人之常情。

在本书中，知识分子的这三种反应，分别以作家兼诗人的王统照（1897—1957）、戏剧家李健吾（1906—1982）和一群在附逆杂志《古今》写作的散文家为例说明。他们在沦陷上海的经验勾勒出这一研究的叙述框架。本书的序言是对沦陷前夕上海知识分子生活的介绍，描绘 1937 年 8 月到 11 月淞沪会战期间知识分子的激情和挫折感。全书主体内容分为三个章节，每一章节论述一种沦陷时期的反应模式。每一种作家体现出知识分子选择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象征性地展示了沦陷上海的生活。

这一传记式的研究方式颇具典型意义。之所以选择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派，并非由于他们在哪些方面上有多少突出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们在沦陷时期的生活经验具有知识分子不确定性的典型特点。他们中没有谁是绝对的无私或者无耻，也没有哪一类能左右了沦陷时期的政治图景。王统照的消极是一种爱国反抗的表达，其背后隐藏着自我隔绝和政治逃避的潜台词；李健吾的生活充满了学术追求和反抗的冲突，他坚持以剧院的艰苦生涯作为抗敌斗争的阵地，而戏剧也成为当时沦陷后期最重要的抗日文艺形式；另一方面，《古今》的散文家们既拒绝对沦陷当局的颂扬，却又享受妥协所带来的回报和特权。因此，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们所代表的正是在黑暗的沦陷时代下，为了生存而导致的道德模糊“灰色地带”。

我选择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派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从事着不同形式的写作：散文诗、短篇小说、现代戏剧和抒情随笔。这些文学形式的风格和意识形态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消极抵抗者耿济之也可以是剧作家，积极抵抗者柯灵

也会在随笔领域一试身手，但是不同文学形式中的批评方式最能体现作者的道德和政治选择，也为我们理解沦陷状况下上海知识分子的生活提供了特别的维度。

走笔至此，已表明了我对战时文学的态度，研究文学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性象征活动”入手的，文学作品成为对特定历史情景的表现和象征方式。[7]通过对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作品的定位，我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成为对相关历史的重建，确定作品生产的“相应历史情景”。这种情景包括写作和出版的社会政治条件、作家的生活和（自我）感知，写作过程中设定的价值观念、历史和文学的再次描述及其艺术创作时特定的人际关系网。[8]

这一阐释方式与我们对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认识相吻合。这些文学作品多具有伪装的外表，藉此躲避可能的政治迫害，而伦理主题、政治弦外之音、个人（甚至自传式的）的痛苦体验成为其主要的形式特征。当然，对大多数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作家来说，文学语言微妙的象征性和符号化特点精确地描述出当时局限的“社会空间”，如同詹姆士·司各特（James Scott）所说，在侵略强权下的空间中，“不公开的异议”是能够被安全地表达出来的。如同下文将要讲述的，这些异议不仅仅出现在公开反抗敌人的作家作品中，而且也出现在一些附逆文人的作品中，拒绝自己的文字沦为宣传工具。因此，在本书中贯穿着我的一个有效的假设，那就是本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应当被视作“潜文本”（hidden transcripts），是婉转的表达“经

---

〔7〕 见 Frede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 Y., 1981, 1—82 页。

〔8〕 见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1983, 特别是 1—53 页和 158—225 页。

过掩饰的思想反抗”，是面对恐怖和死亡时呈现出的一种“遮蔽的批判方式”。总而言之，这一反抗和妥协的复杂性所展现给我们的就是日据上海知识分子的选择模糊性。

目　录

中译本序
1

绪论
1

序言　沦陷在即
1

第一章　隐退：王统照和“抵抗的启蒙观”
25

第二章　反抗：李健吾的戏剧抗争
85

第三章　合作：“《古今》派”的遗民文学
141

结语
205

参考文献
218

译后记　张霖
23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